

新发展格局下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的内容与对策

高文杰

摘要 职业教育适应性是职业教育为应对外部环境需求和变化而改变自身特性的状态和能力。职业教育适应性的基本内容是满足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功能需求。新发展格局下,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的关键是主动满足经济发展“双循环”战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文化、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的需求;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的路径包括:构建完善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优化制度体系;推进产教融合的深化。

关键词 新发展格局;职业教育适应性;内容;教育功能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2)07-0014-07

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要增强职业技术教育的适应性,深化职普融通、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探索中国特色学徒制,大力培养技术技能人才^[1]。面对新发展格局,职业教育肩负重要使命,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显然是这种使命的集中概括。本文旨在界定适应性基本内涵、分析其现实内容的基础上,重点阐释推进职业教育适应性的关键对策。

一、职业教育适应性的内涵

纵览我国学界关于“职业教育适应性”的解读或界定,较多的是从增强适应性的方向、内容展开。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一是认为职业教育适应性是“以其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为旨

归,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适应性的内涵也呈现阶段性发展特征^[2];二是从现实路径视角阐释适应性,认为适应性应抓住“类型特色、多元办学、融合发展、开放水平”四个关键路向^[3];三是认为适应性的落脚点是进一步健全职业教育制度标准、办学格局和结构体系^[4];四是认为增强适应性,就是“要适应双循环经济发展新格局的需要和人民群众对多样化、高质量教育的需要,以促进自身体制机制格局更成型,专业结构更优化,产教融合协同创新贡献率更大”^[5]。

《辞海》指出:“适应性”是生物体随外界环境条件的改变而改变自身特性或生活方式的能力。在作物育种上指某一基因类型或品种适应的环境范围大小^[6]。可见,适应性的本义是来自生物学中的术语,在社会生活中“适应性”的语用带有一定的“隐喻”或借用,表征因应环境改变自身属性的能力。“职业教育适应性”的话语也主要是

作者简介

高文杰(1963-),男,天津职业大学教授,研究方向:职业教育与应用数学(天津,300410)

基金项目

2021年度天津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基于‘双高计划’的职业教育本科专业建设研究”(CJE210220),主持人:陈洁

在这个意义上言说的,但其意涵更为丰富、系统和深刻。本文认为,职业教育适应性是职业教育应对外部环境需求和变化改变自身特性的状态和能力。外部环境主要指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人本需求等方面的性态。显然,考查现实的职业教育适应性在时空维度上会展现出不同样态,如在时间维度上,可以考查某些“时刻”或某个时期,在空间维度上,可以有区域和全国之别。还可以将外部环境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人本需求的某方面做适度分离单独考查,如对经济的适应性,等等。

二、新发展格局下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的内容解析

(一) 职业教育适应性的基本内容

一般地,职业教育对社会与人的诉求能够产生某种适应,是由于其具有这种功能,换言之,职业教育的本体功能是适应性的基础,当职业教育功能与社会及人的诉求产生共鸣的时候,适应性才能发生。职业教育功能也称“职业教育作用”,可划分为对社会的功能与对人的功能;或划分为职业教育本体功能与由国情和禀赋决定的特定功能。可见,职业教育本体功能是职业教育适应性的基本内容。按照经济、政治、文化和科学技术维度,职业教育具有如下本体功能。

1. 职业教育对社会经济的适应与作用

其一,对社会生产力的适应与作用。总体来看,职业教育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适应与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教育培训活动提供合格的劳动力资源,为社会生产力的再生产提供支持;二是职业教育具有传递、积累、发展和再生产科学技术、工艺从而影响科技生产力的功能。

其二,对商品生产效益的影响与作用。职业教育与培训通过向从业者和未来从业者传授专业理论知识、技术知识和技能技巧,使其不断提升劳动熟练度、生产技能以使工艺创新优化、效率递进,进而不断缩短产品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使在一定的时间内获得更高的价值与经济效益。

2. 职业教育对社会政治的适应与作用

其一,职业教育通过教化为社会政治服务。包括职业教育在内的各类教育自然承担了社会公民“培养公器”的社会使命。就职业教育而言,其教学内容和教育行为总是彰显或渗透一定的政治立场、政治观念和思想意识,并影响与教育学生,使其成为具有一定“政治倾向”的人。

其二,职业教育对社会政治传播的教育功能。教育是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和传播机构。国家的政治纲领、治国

理念、方针、路线和政策总是在职业教育领域有各种形式的呈现,这对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传播具有重要价值,彰显职业教育的意识形态传播教育功能。

3. 职业教育对社会文化的适应与作用

其一,职业教育对社会文化特别是产业文化具有保存和传承功能。教育对社会文化的保存、传递作用,是通过教育对社会文化的选择、整理和教育过程来实现的。职业教育对文化的传递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即在传递一般的社会文化的同时,对人类创造的技术文化、职场文化、器物文化、产业文化的继承传递有着更为突出的价值。

其二,职业教育对文化的传播和交流功能。一是职业教育通过书籍、教材和教育模式等形式,实施对其他国家或民族文化的识别、精华选择和优秀文化的引进;二是通过国际交流行为,推动本国文化的传播和多元文化的交流互鉴。

4. 职业教育对科学技术的适应与作用

其一,职业教育对科学技术的传递、积累和发展功能。职业教育是与产业经济、生产领域和职业场域联系最为密切的教育类型,其教学内容的核心部分是指向科学技术、工艺和技能的,因此,职业教育是科学技术传承、积淀和发展的最有效形式之一。

其二,职业教育将科学转化为现实生产技术的功能。在当代,随着产业变革和科技革命,新产品、新技术和新工艺加速涌现,对现实生产和从业者提出了挑战。对此,一方面,职业教育领域可以进行相关技术工艺的“破解”或开展对从业者的培训或继续教育;另一方面,职业教育可以加大具有新技术的毕业生供给。

(二) 新发展格局下职业教育适应性的关键

“一切划时代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7]据此推问,新发展格局下职业教育适应性的关键是什么?

1. 职业教育对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适应

面对国际国内挑战,我国制定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战略,这是我国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主动调整。新时代以来,我国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两个一百年”宏伟目标,已经确立了基本方略^[8]。就经济而言,这些基本方略将与“双循环”战略叠加,使基本方略在推进中获得更具指向性的良性发展。面对新格局,职业教育需着力完善自身功能范畴,突出适配与主动服务的价值取向,达成职业教育的社会诉求。

第一,职业教育要适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一,专业

结构调整要适应或引领产业结构变革。一是与新兴产业关联的专业的增置,如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绿色低碳、现代物流等方面相关专业;二是与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专业,如水利、铁路、公路,以及“新基建”的相关专业。其二,职业教育与供给侧改革的人力资源培养层次结构和数量结构的匹配。其三,适应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产业结构变革,对专业做多维度适应性提升,如专业课程体系向知识技术技能前沿推进。

第二,职业教育要服务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支点是:强化基础研究,开展前瞻性基础研究、实现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建设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对职业教育而言,首先,在教授知识、技能的同时,还需培养创新思维、创新能力;其次,职业教育要自觉走进产业的主战场,深度融入产学研技术创新体系,特别是参与中小型企业的成果转化与创新。

第三,职业教育要助力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的要义是: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我国职业教育涉农专业的种类和规模均显不足成为其适应和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两大困境,为此,未来一个时期,职业教育亟需增设涉农专业,提升存量涉农专业的现代化水平。

第四,职业教育要赋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对照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职业教育增强适应性的重点是:一是伴随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推进,对转移人口进行职业技能或市民素质等方面的培训或教育;二是加大边疆地区、欠发达地区职业教育发展和建设力度;三是紧跟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布局率先服务,如京津冀协调发展、雄安新区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等。

第五,职业教育要助推开放新格局。在促进形成我国全面开放新格局中,职业教育要重点服务“一带一路”倡议和国际产能合作,伴随中国企业走出去开展相关教育与培训,以及培养具有国际视野、了解国际惯例和国际商贸的应用型人才。

2. 职业教育对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适应

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广泛、最

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政治要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面对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求,职业教育对受教育者应该加强两方面教育:一是对受教育者实施优秀公民教育。职业教育要通过各种形式和渠道使受教育者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二是对受教育者进行社会主义政治教育。职业教育通过系统化的教育使受教育者深悟:我国社会主义国家属性决定其必然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主要秉持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

3. 职业教育对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适应

进入新时代,职业教育的文化功能需在发挥本体功能的基础上突出:一是传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涵盖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二是传播与发展创新产业文化、技术文化、职场文化和技能文化。

4. 职业教育对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的适应

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方面包括: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就业质量和人民收入水平;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有效维护国家安全。显然,职业教育均能在上述诸多方面发挥作用,尤其在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和提高就业质量和人民收入水平及其脱贫攻坚能够做出自己的贡献。首先,职业教育需要完善培训体系,提高教育质量。其次,需要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以应对和引领产业转型升级和科技变革、业态变迁,提升就业质量和收入水平。再次,优化和调整职业教育专业结构,强化社会保障、健康中国战略相关的专业设置和专业缺口建设。

三、新发展格局下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的对策

(一) 构建完善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

多年来,在一系列政策和理念的指导下,我国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主体框架已基本建成。但针对新发展格局对职业教育的功能诉求,尚需持续加强和完善。

1. 职业教育的“全体系”建构

按照鲁曼(Luhmann)社会系统理论,社会系统像生命体,具有自主性、自觉性、开放性、自组织性、自修复性和新陈代谢等特征^[9]。职业教育作为目的性的、有控制调节的、与环境互动的社会活动,影响其状态和发展有理念的、运行规则

的和组织架构的因素等。换言之,一个完整的职业教育系统包括思想分系统、制度分系统、实践分系统和话语分系统。无论从职业教育自身建设,还是致力于提升职业教育适应性,完善职业教育的“全体系”建构都是“奠基性”的基本方略。

第一,健全职业教育思想体系。职业教育思想体系是系统化的关于职业教育的观点、思想和理论的总和。按照科学学理论,职业教育思想体系要有自洽的学说、理论和逻辑结构。按照库恩范式理论推演,职业教育思想体系的标志之一是具有成熟的共同范式,即要有共同信念和公认的范例。我国职业教育思想核心已基本形成,主导观念包括:一是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组成部分和人力资源的供给者;二是职业教育的办学模式是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知行合一;三是职业教育是一种教育类型,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且具有自身特征;四是职业教育的“产出”指向是培养面向社会产业的从事技术技能实践的专门人才;五是职业教育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密切关联,发挥一定的社会功能。尚需加强建构的方面包括:一是从哲学高度对职业教育的主导观念等进行理论建构,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哲学;二是厘清职业教育的概念体系,特别是使概念的内核和边界尽可能清晰;三是形成职业教育的范畴体系;四是梳理好职业教育的逻辑体系。

第二,培植职业教育的话语体系。职业教育话语体系是关联职业教育领域的体系化、结构化的语言系统。职业教育话语体系的作用可概括为:一是标志性,不同国度或区域的职业教育一般有自己特有的概念、范畴、逻辑和“偏好”;二是刻画性,一套合适的话语体系无疑是对关联对象所形成的“语言性映像”,其话语体系就是对象的认知、情感、意旨和诉求话语形态的表达。我国职业教育话语体系存在缺位现象。首先,我国职业教育话语体系与我国大国地位、大国形象和新时代新要求尚需契合。在国际职业教育话语体系中,我国职业教育的国际传播、影响力和引导力不强,与我国大国地位和“大职业教育”还不甚匹配。其次,我国职业教育话语体系还未能充分反映和“解构”我国职业教育的伟大实践和发展理念。目前,我国职业教育的话语还基本习惯于简单套用西方的范畴、概念和结论来解读我国职业教育的实践,有“削中国实践之足、适西方理论之履”之嫌。基于此,构建中国职业教育话语体系的着力点是:其一,中国职业教育话语体系要反映当代职业教育宏大的创新实践;其二,集中优势力量,扼住关键“话语”重点攻关,如产教融合、工学结合等;其三,加强传播机制,为壮大话语权铺路。

第三,建强职业教育实践体系。职业教育实践体系是指职业教育全部活动的组织机构、群体与个体及其活动组成的集合。我国职业教育实践体系的组成特征是:国家层面职业教育实践体系的组成大体有政府行政管理机构如教育部,省市(直辖市)自治区职业教育子系统(不妨称省域职业教育)等构成。省域职业教育组成由教育厅(局)、县域职业教育子系统、职业院校等构成。与这些系统紧密联系的还有其他社会组织机构,国家层面与职业教育密切联系的有国务院、部委、大型国企和大规模高新企业或集团;与省域职业教育密切关联的有省域厅局、行业企业和县域政府机构等,这些组织机构在一定情形下可以作为职业教育相关实践体系的组分来看待。另外,职业教育系统作为组分又是教育大系统的构成部分。职业教育实践体系的运行结构特征是:政府通过职业教育的顶层设计,包括规划、政策制定、制度供给和专项行动设计与组织实施,通过资源供给和配置调整,办学标准供给和办学质量效益的评价等工具,对省域县域等政府相关部门和职业院校进行宏观调控和治理;职业院校按照制度、政策进行教育活动,包括招生、教学和向社会输出毕业生等核心环节,以达成自身社会职能。

为实现职业教育目标,其实践体系要有合适的结构和行为模式。按照教育结构学的观点,职业教育结构的要义是:一是教育系统的体量或规模适当,即职业教育的规模与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学龄人口和民生需求相匹配。二是教育大系统内部子系统规模及其之间的配比适当,即使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等规模比例适当,同时使职业教育中的初等、中等和高等层次之间的比例适当等^[10]。本科及其以上层次的职业教育规模尚显薄弱,亟待加强。三是教育大系统中各子系统横纵方向的联通性。构建纵向贯通、横向融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四是基于公共治理理论视野,理顺关系、简政放权、依法治教。五是资源依赖理论视角,保障和提升教育资源质量。

2.培训体系的建设完善

2019年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指出:“落实职业院校实施学历教育与培训并举的法定职责,按照育训结合、长短结合、内外结合的要求,面向在校学生和全体社会成员开展职业培训。”^[11]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典型学校本位的职业教育范式,职业培训在职业教育体系中份额较弱,不适应产业经济发展和科技变革的需要。对此,完善职业培训体系的关键点包括:一是做好顶层设计,涉及培训工作的理念、准则、标准、规划和体制机制;二是优化完善培训体系,建立职业院校、行业企业和社会组

织为元素的培训网络结构,并做好与职业教育体系的有机耦合;三是推动重点优先发展产业为先的培训,使培训整体工作支持产业转型升级,其中重点围绕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人才紧缺领域开展培训;四是积极稳健培育培训市场,加强治理,有序推进社会培训评价机构。

(二) 加强职业教育制度体系建设

制度哲学认为,制度是具有规范意味的实体或非实体的历史性存在物,它作为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中介,调整着相互之间的关系,以一种强制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与社会的发展^[12]。职业教育制度体系是关于职业教育领域的规范体系,涉及制度、体制和机制,形式包括法制、政策规范、决定、章程和意见等等。职业教育制度对职业教育社会活动具有确定界限、形成秩序、提供预期和营造环境的功能,是职业教育契合目的、有序运行的重要基础和保障。

我国职业教育制度供给的瑕疵与困境表现在:其一,自洽的制度系统性尚需提高品质;其二,制度环境的培育尚需有序推进;其三,制度执行异化的预判尚需做好消弭对策设计;其四,制度体系内在观念的一致性和协同性尚需加强;其五,简单“权力威力”的不当使用导致的偏颇;其六,运动式、急功近利的政策催生“形式主义”的“奉迎”现象时有发生。克服现实瑕疵与消解困境的路径,是遵从制度科学的基本规律,面向重点领域着力做好微观或不同侧面的制度供给,打造自洽的制度体系。

1. 把握制度的系统性、协调性,形成制度链

首先,由于职业教育的结构和运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制度供给和设计必须基于系统的思维。一是建立完善的制度系统,即是对职业教育构成和运行设计相关的制度框架,形成制度链,把控好不同制度之间的关联性、协调性和配合性。要从操作的角度考虑制度的布局、链条。例如,对于产教融合企业的“金融+财政+土地+信用”的组合式激励政策,就要在企业的土地征收、税务等制度方面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和调整等。二是制度设计要关照制度的理念、对象、规则和载体要素,做到协调配置。理念是制度规则所体现出来的价值选择;对象是制度的指向与范围;规则是制度的内容,是一些基本的准则、标准、规定等;载体是制度的形式,如法律、章程、规定等。制度的四个要素共同作用才使得制度有了实质性的内容、功能和意义,因此,制度内容的设计要厘清四个要素的内涵和外延。

2. 注重制度本体的合理性、合法性和现实性

职业教育制度作为相关活动中人、事和物的中介物,其

效率、功能和价值取向是判断其优劣的重要标志,而使其形成并规定其品质的是所谓的制度的合理性、合法性和现实性^[13]。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三性”是主体对制度评价的指标或维度。合理性是指制度在形式上符合逻辑性,制度实施程序通达,制度内容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合法性是指制度获得制度对象的认同、对规范正当性的认可,其根本价值取向是公平、正义和增进社会与个体福祉。现实性主要是从制度的可实现性和可操作性方面而言的:一是制度必须与历史发展阶段相适应,二是制度具有实际的可操作性和可运行性,三是制度的实施成本是适度的,过于高昂则使实现性受损。显然,制度的合理性、合法性和现实性既是相互独立的又是相互关联与依存的。因此,在职业教育制度设计中既要关注每个方面的达成又需关照这些方面的整合优势。

3. 遵循制度运行和演化规律

制度创新与制度演化都具有一定的规律,在推进职业教育制度建设中要遵循制度创新与制度演化的规律,创造制度的最佳效益。一是“戴维斯-诺思(Davis-North)五阶段”论^[14]。即制度的演进需经历一个所谓“第一行动集团”到“第二行动集团”及浸润到其他相关群体的协作互动的五个阶段。要掌控好制度推进的节律,尤其是“第一行动集团”的组织发动、反馈调节。二是制度变迁中的“时滞”现象。时滞是指从制度的认知、动员到启动的时间与过程,“时滞”现象指明新制度的推进需要一个前期的酝酿准备阶段。要做好制度“着陆”的“生境”营造,包括新制度优越性的宣传、弘扬,为新制度落地生根创造条件,做好与原有格局的无缝衔接。三是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规律。路径依赖是过去的制度框架为现在的组织提供了机会这样一种累积性的制度演进过程。这种现象既有良性效应也有负面效应。要密切跟踪制度演进不同阶段的效果,既要关注制度的直接反应,也要重视长远影响,避免积弊难返局面的出现。

(三) 推动产教融合深化发展

1. 产教融合的应然性

依据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的复杂性理论,产教融合是一个“宏大概念”^[15],概念核心是社会产业和职业教育两大社会组分协同开展职业教育。改革开放以来,政策语境的产教融合最早出现在2013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对产教融合做了全面深入的阐释,具有标志性意义。

产教融合的“真理性”具有多维的论据支撑,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也是提升职业教育适应性的最富效能的路径。从历史维度看,德国多年实施的“二元制”模式在20世纪70年代获得法律意义上的确证;英国实施的“三明治”模式在19世纪初开始兴盛延展至今;美国实施的“合作教育”在20世纪初以法案形式加以确立;日本20世纪初开始实行企业培训、校企合作。总的来说,在世界范围内,职业教育先进国家结合各自国情和禀赋采取了不同的职业教育发展体系,但其中产教融合之路确是共同的主体路向。从现实维度看,产教融合应然性的论据可概括为如下几点。其一,产业界对于输入“劳动力”的质量规格与职业教育界对人才培养目标的认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其二,职教界的教学领域与产业界工作领域在培植学生职业能力上具有同一的“场域”集合或称最大的交集,为产教融合特别是产业界投入职业教育活动提供了可能性、便利性和优越性。其三,从知识的视野看,职教界培养职业能力的知识系统与产业界的知识系统是同构的,或者说职教界的知识系统导源于产业界的知识系统;并且从知识更新或前沿性来看,产业界比职教界的知识系统更前沿,对职教界的知识系统更新具有引领和决定作用。其四,职教界储备了一定时间和空间的技术知识和科技研发产品,并具有科学、技术和工艺研发创新的潜力,这为职教界和产业界融合创新提供了良好预期。总之,职教界在培养目的和产业界吸纳技术技能人才的目的、培养人才的资源存在共生、同一的天然基因,在技术创新领域具有聚合的系统性优势。综上得出,产教融合是一种最优化策略。

2. 产教融合的路径

产业界与职教界作为两个系统,其构成要素的联姻共同致力于培养经济社会存续和发展所需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各种行为模式均可成为路径集合的元素,其关键在于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因此,路径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对行动的启示是既要重视成熟路径的优化也要聚焦路径的创新。

产教融合的路径可以从组织形态、行动领域来梳理。产业的组织构成元素包括企业、公司、科研机构、科研生产联合体、行业组织和政府管理组织等,这些元素又构成网络结构。职教界的组织构成元素包括职业院校、政府管理服务组织等,这些元素在现实性上又由于行业、区域联合等形成复杂的网络结构。因此,从组织的视角看,产教融合形态的要义包括:其一,产业界构成元素和职教界构成元素之间可以形成多种联合组织样态,如职业院校和企业、职业院校和

科研生产联合体、政府管理服务组织与企业联合等;其二,产业界和职教界构成元素在“界内联合”后再与产业界或职教界构成元素联合,如职教集团形态、产业学院形态等;其三,产业界和职教界构成元素的“亚结构”之间也可以形成联合,如二级学院层面的混合所有制或股份制学院,职业院校中的技术研发机构与企业的联合等;其四,产业界和职教界或其构成元素联合形成不同“粘度”的组织,其可以从构建具有法人地位的、资金独立的组织到一般松散联盟之间不同样态的选择区间;其五,根据产教融合的发展,以及降低“社会成本”的考虑,在职教界和产业界之间可建立“中介组织”“第三部门”,服务于产教融合。

从行动领域视角看,产业界活动主要包括营销、生产、服务、科技产品研发,以及人力资源的保持、提升和更新活动等;职教界活动主要包括教学、知识生产、科技研发创新、专业建设与课程开发、教学创新和社会服务,还包括促进毕业生就业等。产业界和职教界的融合要义可概括:其一,产业界活动和职教界活动进行耦合,开展有利于职教界或有利于产业界,或使双方均受益的活动,如教学与生产的结合致力于培养学生,再如某些生产性实习使产业和职教两方获益等;其二,产业界和职教界活动包含的“子活动”之间的耦合,以及活动联合之后的耦合,如企业参与人才培养方案、新专业设置、专业标准制订或课程建设属于前者,再如校企合作订单培养则属于后者;其三,按照WSR理论(物理—事理—人理系统方法论)^[6],可以在产教两界活动的物流、事件流、人员流和信息流(包括知识流)之间架设产教融合的路径,如校企共建实训基地,校企互派人员到对方从事相关工作,现代学徒制,产业界最新的生产规范、技术和工艺及时反映于教学,开发手册式、活页式与工单式教材等。

3. 优化产教融合的支持条件

上述从产业界与职教界组织构成与行动构成元素简单梳理了两界“联姻”的可能路径,但要使其成为现实性和常态模式则需要一定的条件。概括来说,构设这些条件的底层逻辑依据主要是:其一,基于“成本—收益”理论,对产教两界来说产教融合获得的足够大净收益是产教融合成为常态的基础和前提。当然这里的收益既包括物质价值形态的收益也包括精神形态的收益。其二,产教融合具体模式的形成是一项制度创新,需要较高的社会成本克服“路径依赖”,需要耗费一定的成本支出。其三,对整个社会而言,产教融合的收益大于成本,但对于企业、职业院校等个体未必形成积极进行产教融合的收益和动机,这种矛盾性的一面成为产教

融合深入推进的阻碍。其四,针对不利于产教融合模式推进的阻滞因素,政府要采取最有力与合适的路径。政府主要工具包括规制工具、经济工具和宣传教育工具,规制工具主要是政策供给、制度创新,要点是规定和赋予相关主体产教融

合的责任义务,制定行为规范和激励政策;经济工具主要是资金支持、政府购买服务和经济激励制度的设计创新;宣传教育工具主要是创设文化环境,传播产教融合的理念和典型模式。

参考文献

- [1]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EB/OL].(2020-11-03)[2022-01-02].<http://www.gov.cn/zhengce/2020-11/03/content-5556991.htm>.
- [2]潘海生,林晓雯.新发展格局下职业教育的适应性发展[J].职业技术教育,2021(15):15-20.
- [3]李桂云,等.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陈子季:提质培优加快构建中国现代职教体系[J].中国远程教育,2020(9):25-32.
- [4]李玉静.新发展格局下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内涵与定位[J].职业技术教育,2021(5):1.
- [5]邢晖.职业教育“十四五”:格局性变化,适应性施策[J].职教通讯,2021(1):1-2.
- [6]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1182.
- [7]张磊.理论强党,努力在思想认识上达到新高度[EB/OL].(2019-03-15)[2022-01-27].http://news.cnr.cn/theory/gc/20190627/t20190627_524665969.shtml.
- [8]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7-50.
- [9]高宣扬.鲁曼社会系统理论与现代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5-11.
- [10]金哲,等.世界新学科总览[M].四川:重庆出版社,1986:252-255.
- [11]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EB/OL].(2019-01-24)[2022-02-02].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9-02/13/content_5365341.htm.
- [12][13]辛鸣.制度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51.195-219.
- [14]诺思.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127.
- [15]埃德加·莫兰.复杂性思想导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74.
- [16]顾基发,唐锡晋.物理—事理—人理系统方法论:理论与应用[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15.

The Content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Improving the Adaptability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Gao Wenjie

Abstract The adaptability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the state and ability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o change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according to the needs and changes of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The basic content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daptability is to meet the functional needs of social economy, politics, cultu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key to the adaptability of the new era is to actively meet the needs of the “double cycl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socialist democratic politics, socialist culture, and ensuring and improving the level of people’s livelihood. The ways to enhance the adaptability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 include: constructing a perfect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ystem, optimizing the institutional system, and promoting the deepening of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Key words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adaptability; contents; educational function

Author Gao Wenjie, professor of Tianjin Vocational Institute (Tianjin 300410)